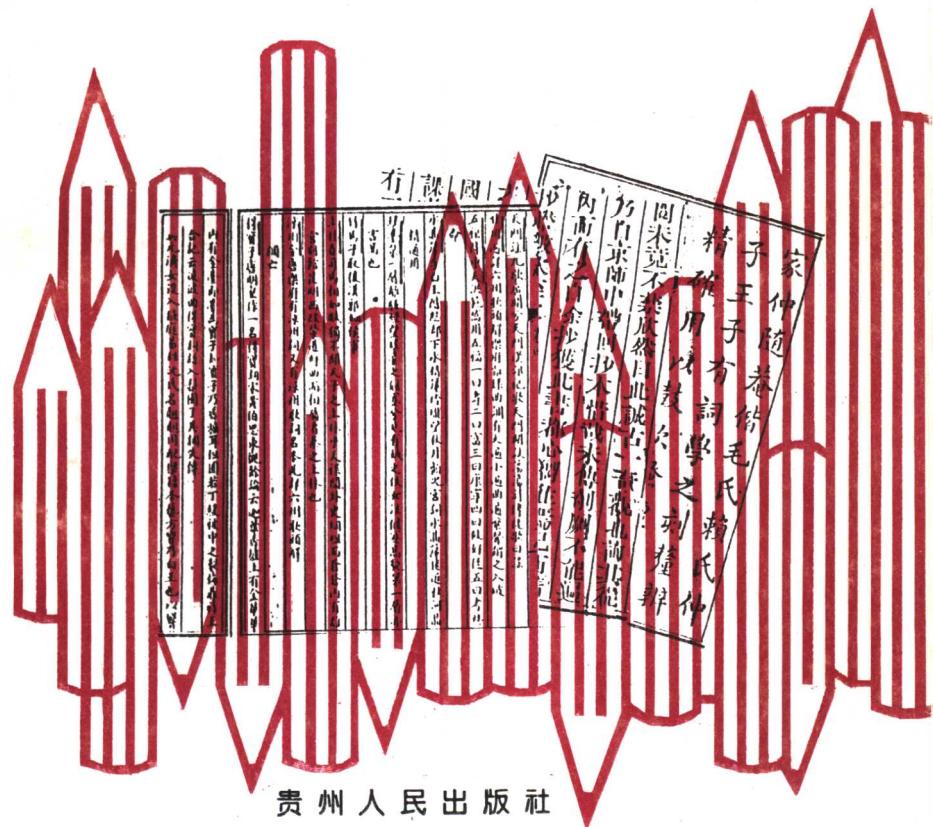


中国文献学综说

王燕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献学综说

王燕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程小铭
封面设计 周 红
版式设计 裴 铸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 550001 电话: 6828993
通讯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 68 号附 1 号

中国文献学综说

王燕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4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221-04281-0/K·374 定价: 15.00 元

序

《中国文献学综说》，为贵州师范大学王燕玉教授在讲授《文献学》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经过修订润色而成。得知贵州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此书，燕玉师嘱咐写一小序，师命难违，欣然允诺。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掀起了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热潮，这一讨论，有助于我国古代文化知识的普及。紧跟学术界的讨论，许多高校把传授古代文化知识，分列出若干课程开设，向学生较深较细地讲授传统文化，《文献学》就是其中一门。因此燕玉师的《中国文献学综说》的公开出版，无论是向一般读者普及古代文化知识，或是作为高校开设《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燕玉师长期致力于文献、方志之学，功力深厚，故书中采辑、征引的材料相当丰富。全书除按传统《文献学》体例，对目录、版本、校讎三方面的源流演变，以及主要人物和重要著述有全面叙述外（这种叙述亦不同他书），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作了较详细的阐明。

本书内容详实，各部分都搜据充分的材料。说明确的道理，其中较多著者独到见解，如“简策是写非刻”，“书籍当分著作、撰述、抄编三类”，“校讎不能包括代替版本、目录”，“指事应先于象形”，“《中原音韵》并无学术价值”等等，俱是一家之言。

本书逻辑周密，全书第一章论述文献和文献学的定义与范围界线，笼罩全书；中间两章具体分述文献所包内容；最后三章分说文献学的基础、提高和分工，由浅及深。各章组织，介说各项

专门知识，都从古到今，各具系统，如“简策”即简策小史，“训诂学”即训诂学小史，“注释”即注释小史，而其间的衔接都贯串着文献与文献学。

燕玉师著作、论文，其行文言简意深，“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赵翼语）。该书稿在遣词造句、编写格式上都是很下功夫的。综观该书，文字简洁，尽量删除可要可不要的词句；力求少用标号，避免排列成挂帐式的条文；引有材料或在句前直书何人何书，或在句末括注何人何典，不取另注方式。

本书既可作高校文科文献学专业课的教材，也可作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引导奠基石。

我们期待燕玉师的其他书稿也能一一正式出版。

谨此为序。

张祥光 朱健华

1996年6月

《中国文献学综说》自序

这本书的来由述下，以作序言。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组织上研究排课时，深感本系学生在中国史方面，知识眼界太过窄狭，对古籍和古代语文几乎无知，阻碍阅读提高，考虑应有的相关学科，至少六七门，如果一门一门地开，人手时间都不容许，于是想出开文献学这个办法，把该懂得的许多科知识，囊括起来讲授，不要求专而深，但求周到具体，目的使学生对中国学术的门径、概念源流、理论法则、词语特性，获得系统了解，打下坚实基础，由之钻研史学有效，钻研其他学问也都利便。而将此任务委托我，我认为难度虽然大，却富有意义，就勉力承担了。

据我所知，“中国文献学”这门课，全国院校极少开过，故无教材可依，亦无经验可法。搜查专著，寥寥无几，只找到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1982年齐鲁书社），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1982年中州书画社），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83年上海）四种。浏览之余，认为这四书角度悬殊，出入很大，吴、郑两家莫可吸取，王氏之书，取材较丰，却偏而不全，张先生之作，是开创性奠基性的，使我颇受启发，但有不少独特见解，却又未能赞同，尤其不能作为教材，只好另行编排，凡引用的都加说明。

本人所编讲授总纲，共六章二十三节，由于开课时间紧迫，来不及写讲稿，仅印发了细目，引用材料边讲边抄，依靠助教老师抄给学生。这样作为选修课讲了一学年，听课的老师和学生反映

良好，都说历史系开这课必要，中文系也适宜开这个课，事后有的老师建议，最好写成专著印行，作本系今后本课程教材，兼供别系他校及文史工作者参考，敦促本人撰为此书，定名《中国文献学综说》。我想在目前文献学著述薄弱的情况下，希望这书能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至于偏见及缺误，估计必是难免的，如蒙指正，甚符下怀。

1987年8月王燕玉于贵阳

目 录

序	张祥光 朱健华 (1)
《中国文献学综说》自序	(1)
第一章 文献、文献学义界	(1)
文献	(1)
文献学	(3)
第二章 文献记录的形质	(6)
第一节 甲骨文	(6)
第二节 金文	(11)
第三节 石刻文	(15)
第四节 简牍	(18)
第五节 帛书	(24)
第六节 纸卷书	(27)
第七节 纸册书	(32)
第三章 文献主体的书籍	(45)
第一节 书籍的分期	(46)
第二节 书籍的体裁	(56)
第三节 书籍的增加	(59)
第四节 书籍的散亡	(72)

第四章 文献学的基础学科	(78)
第一节 版本学	(78)
第二节 校讎学	(116)
第三节 目录学	(145)
第五章 文献学的提高学科	(188)
第一节 小学	(188)
第二节 文字学	(190)
第三节 音韵学	(211)
第四节 训诂学	(239)
第六章 文献学的工作分类	(268)
第一节 辨伪	(268)
第二节 注释	(282)
第三节 翻译	(287)
第四节 辑佚	(292)
第五节 编丛书	(295)

第一章 文献、文献学义界

文 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孔子的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个词笔者认为是并列结构，由两个内容的概念组成，所谓文，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文字记录；所谓献，指人们口耳相传的重要言行。依历史进程看，献先于文，远古祖先创造文字以前，一切生产生活经验的行远与垂后，全靠世代口耳相传，这个人说给那个人，故生出“贡献”、“奉献”、“陈献”、“献进”“献替”、“献纳”等词。《尚书·益稷》篇云“万邦黎献，共惟帝臣”，传云“献，贤也”，贤的意思，是说能有效传达过去的众多事物。待创造文字的初期，刻写不是那么普遍容易，少数人对重大事物已作书面记载，多数人对一般事物仍由口头传说，且为主要的大量的，试想春秋后期的孔子，要讲夏、殷两代的礼制，还感到二代后裔的本土杞、宋两国，书面记载与口头传说都不足，未能证信，可见当时书面记载还很困难，与口头传说并行为两事。到了秦、汉大一统，书写工具已较齐备，书写字体从篆改隶已较便利，学者们了解研究前代，不管书面记载、口头传说，一律都用文字写下传给后人，文与献合在一起变成书面记载，而遣词沿用“文献”来统称。从研究价值看，客观事物的记录固然紧要，人们的传说议论也不可轻视，应该并重。

我国汉代以后，凡整理考论文献的学者，事实上对前述两面

都兼顾，没有偏废的，如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还在说“文，典籍也；献，贤也”；仍用古义，解释不太具体，但兼顾两方面，则是可理会的。至于由实定名，循名责实，具体正式明确概念者，当数宋末元初的马端临，他编撰巨著《文献通考》348卷，贯通元以前的历代典章制度，对取材明白地分为客观记载与人们言论两大来源，其《自叙》道：“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于后焉。”这段话里，诠释“文献”清楚不过，其书顶格写者为文，低一格写者为献，低两格写者为考，体现文与献两者相辅的作用充分，况又订之以“考”，可看成我国古代文献研究的硕果。

根据上述情理，今天来归纳文献的含义，范围广阔，只要用文字记下的事物言论，都叫文献，诸如甲骨卜辞、金石铭刻、简牍、帛卷、纸卷、纸册，都在其内，显然以书籍为主体，可以说极囊括之能。然而也不应是无所不包，如今新编《辞海》、《辞源》文献条文，不知按照谁的说法，释为概指图书文物资料；又如近两年的《文献》期刊，有些学者解说“文献”词义，“不以文字史料为限”，往往泛滥漫无边际；均嫌不划界线，本人未敢苟同。比方文物为例，原始人的头骨牙齿属古人类，无文字的陶、铜、漆器属古器物，无题款的图画属古美术，家具及其模型属古铸造，房屋遗址属古建筑，都是考古学的范畴，却有人称之为“历史文献”，那就混乱难从了。

文 献 学

文献范围既广，研讨文献所含内容之学众多，按我国传统的粗大分法，解说儒家典籍的叫经学，训释汉字形、音、义的叫小学，考证史书史实的叫史学，梳理总集别集的叫文学，表述山川风物区划的叫舆地学，阐发儒家以外学术著作的叫诸子学，这各门学问里尚可再分，不胜枚举。至于讨论文献本身，即以整理疏通前代书籍为主要对象的学问，则总称文献学，这学问事实上源远流长，但直到清末，从不同角度而有各种名称，却无“文献学”这个总名，总称文献学始于何时何种情况，我目前尚无多数依据核定，仅查到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面曾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那末暂时可言，起于民国初期。而“广义的史学”这个话很有意思，不是说文献学即史学，而是说文献学对历史学特别重要，因为治史，必须以资料事实为前提，离开文献简直无法着手，不比哲学侧重思维逻辑，不比文学侧重才力想象，不比语言学侧重口舌锻炼，不比教育学侧重心理实验，不比美术学侧重造型意境，各各能在少甚至无材料的条件下，仍可有所成就，当然，这是相对而言，任何学问有文献知识总较优越，不过史学更不可缺。

我国自汉以来，文献逐渐增加，也在逐渐散失，留下来的问题很多，常见篇章脱缺，字句衍逸错倒，为了保存给予后人研读方便，历代都有学者对前人的文献，进行疏通整理，付出辛勤劳动，从而积累了浩繁的文化遗产，功绩非小。当今百业猛进，学术昌明，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凡事不能割断历史，各门学问都有其承续性，因而整理古代文献，不惟需要，且还迫切，既富现实意义，又具深远历史意义。现存古籍大致 15 万种，数量庞大，情况复杂，前人不需要、未整理过的，今天需要都得整理，前人已

整理而未精良的，今天需要还得重新整理，可是文献专业工作的人，目下远远不够，应该培养一批青年，在这方面发生志趣，专门从事文献工作，即使终生不懈，也是做不完的。先当学习前人经验，然后加上现代科学方法，对旧留和新发现的文献，选择分工梳理、使杂乱的资料有系统有条理，使艰奥的文章变通俗变明朗，进而区别精粗，较论得失，提供各门专业学者吸取，让他们可节省时间精力，有效加速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这就是当前文献学者的任务。

历史上的大学者，贡献比较卓越的，一生勤奋著述，莫不穷年累月，先由梳理文献入手，再在文献准确的基础上，结合客观实际考察，潜心创出宏伟成果，如史学的司马迁、刘知几，经学的许慎、郑玄，地学的郦道元、李吉甫，文学的沈约、刘勰、韩愈、欧阳修，理学的朱熹、黄宗羲，小学的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王念孙，说明无论治哪门学问，第一步都需文献知识。反过来说，文献学者，若无各门学问知识，整理文献也是搞不好的，刘向、阮孝绪、陆德明、颜师古、毋煖、慧琳、马端临、朱彝尊，这些人物无不渊博惊人，才能在文献上大放光彩。然而其间的义界，却不可笼统混淆，笔者这里所持的主旨，对文献和文献学，在于阐明含义，划清界线，区分类例，辨述源流，“文献”以用文字记录的事物言论为范围，其中书籍为主体，而不可漫无边际，包括文字记录外的资料；“文献学”应以疏通整理文献本身为范围，其中以书籍为主要对象，大体当分辨伪、注释、翻译、辑佚、编类书、集丛书六类，而不可把修史（史学）、纂志（方志学）、绘图（地理学为主）、制表（各学）、编字典（文字学）、撰辞典（训诂学）等都纳入，亦即只治文献本身，提供系统可靠材料，给别人去治史、哲、文诸学，避免越俎代庖，这样分工配合，推进学术文化更觉有效。至于文献学所需的智能，固然越广深越善美，无

如一人时间精力有限，泛究各门学问势无可能，笔者认为有六门甚必要，文献工作者当系统涉猎，即版本、校讎、目录三科作基础，而文字、音韵、训诂三科作提高，也都只求基本锻炼，勿庸深研入而忘返，以能解决文献中的问题为度。如此论文献、文献学，似较妥切。

第二章 文献记录的形质

第一节 甲 骨 文

异名解释

总说一句，甲骨文是我国已发现的早期文字。分别解释，就记录文字的材料说，是龟甲和兽骨，龟甲多用腹甲，少数也用背甲，兽骨多用牛胛骨，少数也用其它动物如鹿、猪等的骨，故合称甲骨文。就记录文字的工具说，是用锋利的青铜刀或玉刀在甲骨上刻字，故旧称契文，契字本意为刻；偶尔有用一种笔蘸红汁或黑汁写上的，极端罕见。就记录文字的内容说，是上古当权执政者对各种事务占卜吉凶的语句，故称卜辞。就发现此种文字的地点说，是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该地为商代第二十世王盘庚迁定后直至商亡 270 余年的国都名殷的遗址。故旧称殷虚书契，今称殷虚文字，虚即墟的本字，义谓遗址。就安阳出土卜辞的时代说，是殷商王武丁、祖庚、祖甲、禀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前期凡九朝，绝大多数为王问疑的，称王卜辞；少量为贵族问疑的，称非王卜辞。

卜辞要点

殷商人敬信鬼神，其王朝尤重神权，几乎无日无事不行占卜，诸如祭祀的祥晦，战争的胜败，畋猎的顺阻，稼穡的丰歉，畜牧的繁简，疾病的好坏，以至妇女生育、天时晴雨、“卜旬”（十天

内吉凶)、“卜夕”(当夜吉凶)，事先都问鬼神，事后都记结果。其法由专职官员巫史举行仪式，把请问的事向鬼神祷告，用火柱烧炙甲骨背面的圆穴，甲骨正面爆出纵横裂纹，被认作鬼神意旨的征兆，巫史解说裂纹形状，从而判断所问事的吉凶，便叫占卜，占字本义为祈求，卜字本义为爆示。

占卜既属王朝常规，所需甲骨量大，定由各地各邦贡进，如武丁朝光(地名)贡龟518只。凡贡自何处，数若干，何人押送，要记录。甲骨使用前须修治，去血肉叫“剔”；次锯削磨平叫“工”；后于背面以刃具挖枣核形穴，其侧以钻具钻圆穴使可通连枣穴，这样多处，排列整齐，叫“示”；加修治人名，要记录。修治完一批成品，交何人保管，要记录。上述三项记录，刻写在甲骨无凿钻处，多属边缘，合称“署辞”。当占卜时，巫史先于甲骨上刻写日期与己名，今称“前辞”。次刻写请问的事件，必须正问反问，如先问下雨么？再问不下雨么？今称“命辞”或“贞辞”，刻写又须对衬，腹甲的一对刻于“千里路(中央盾纹)”两侧，胛骨的一对刻于骨边，由下向上排列，隔一辞或两辞相对，第一辞对第三辞，第二辞对第四辞，表示正反。次于裂纹旁边，刻写每一问灼若干兆，以及兆的次序与性质，今称“兆辞”。次于兆辞附近，刻写据兆而判断的吉凶，今称“局(果)辞”或“占辞”。占卜已毕，主者如王将判断的结果告知多君(部落议事会)，待一段时间后，那件事实际出现的结果，无论证明预测与否，巫史都要补刻写于原甲骨果辞后面，今称“验辞”，即追记应验事实之辞。

最完整的卜辞，全备以上六个部分：署辞，前辞，命辞或贞辞，兆辞，果辞或占辞，验辞，这种很少，多数只是前辞、命辞、果辞。卜辞刻写习惯，上下排为直行，行基本向右转，不过限于材料面积，靠外缘的卜辞向内转行，左侧外边的卜辞向右转行，右侧外边的卜辞向左转行，腹甲近千里路的卜辞向外侧转行。一版甲骨的卜辞长，若正面刻不下，可转反面，反面通常安排都刻前

辞；若卜辞短少，一版又可刻两条以上，两条之间划一线，示相隔开；胛骨边缘狭小，长卜辞边上刻几字，引向骨扇刻写全文，可相照应。每一占卜事件到刻验辞完结，所用甲骨交存专门处所保藏，特殊要緊的填涂朱、墨于字划，并有专门人员管理，小屯村YH127坑某贵族所刻卜辞腹甲上，记有“三册，册凡三”字样，即九版合一组，可推想甲骨庋藏有制度组织，毫不随便。因而历朝甲骨累积如山，商王朝灭亡后，殷都荒废，久而埋入地下，甲骨随之，至清末出土被发现，从偶然注意，到深广研究，几十年来，已形成甲骨学。

巫史来历

原始社会人类，不能理解自然现象，白昼黑夜，风雨雷电，或怪异，或恐怖，认为神鬼为之主宰，因而崇拜信仰，生出祭祀、祈祷、占卜之类仪式，逐渐繁多、经常、隆重，需人安排主持，于是头脑较灵、经验较丰的人，出来充当沟通神与人的中介，渐成专业人物，被称曰巫。巫既负责敬神大事，先得掌握文化知识，原始社会末期，劳动人民约定俗成，已在发明使用文字，不过形、音、义都散乱，巫为积累经验，记录各种情节，不断搜集整理文字，以利推行原始宗教。进入奴隶社会，巫的沟通人神，不复再为全体人民，仅为统治阶级服务，即助奴隶主统治奴隶，而文字也被统治者垄断，广大人民反成文盲，巫因拥有文化知识，主持宗教神权事务，地位日益重要，上升变为大官，被称曰史。以其既承前代宗教职能，又兼后代图书教育责守，我国古籍通称巫史，表达含义可谓恰当。殷商时期，修整文字，主管占卜，解说征兆，判断吉凶，刻写甲骨，所谓专业王官，即此巫史担任，虽属最高统治者的帮凶，本身也是统治者奴隶主，欺骗麻醉群众，固然有罪，但其集理文字，记录卜辞，保存资料，传续文化，客观评价，功绩也未可抹杀，向使无一系列巫史，我们今日哪得甲骨文讨论呢？